

# 现代转型期长篇小说的衰落与短篇小说的兴起

赵斌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中国现代转型时期长篇小说的衰落和短篇小说的兴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学现象。其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与世界短篇小说繁荣紧密相联,也与“西学东渐”(翻译)密切相关,更与中国的时代政治、报刊杂志、创刊观念等小说的外部因素息息相关。

**关键词:**现代转型;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衰落;兴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6-0058-06

一旦把小说文体学与时代的转型关联起来,就会发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普实克说:“在亚洲文学史中,恐怕没有哪一个主题像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深刻决裂以及探讨其发生的原因和意义更吸引人的了。”<sup>[1]</sup><sup>[101]</sup>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时期,从“晚清长篇小说的衰落”到“五四短篇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一种“决裂”方式。这种“决裂”很复杂,似乎是顺应“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sup>[2]</sup>国际潮流的结果,也有“西学东渐”的影响,更有报刊杂志、时代政治、文学翻译等小说外部因素的影响。

## 一、短篇小说及其理论的兴起

金圣叹、脂砚斋、毛宗岗、张竹坡等明清小说理论家都对小说理论有所探索和建构,但是,由于古典长、短篇小说的艺术界域不明晰,理论家们对长、短篇小说之间的艺术差别关注不多。到了晚清时期,随着“新小说”革命的扩展,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越来越勤恳,小说创作的理论意识也日益突出。五四时期,胡适、郑振铎、茅盾等小说理论家不再满足于晚清小说“只言片语式”的艺术研究,他们系统地梳理了小说理论衍变的谱系,也理清了现代长、短篇小说的艺术差别。这些艺术探索为五四短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小说理论家是从古典小说着手,通过

对西方小说理论的借鉴,结合时代的理论需求而进行的理论建构。郑振铎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其篇幅的长短对小说形式的影响不大,因为,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都只是一个形式的东西的放大或缩小而已”<sup>[3]</sup><sup>[37]</sup>,并且,中国的短篇小说应该“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sup>[4]</sup><sup>[3]</sup>。可见,古典小说类型的划分只是小说篇幅的长短而已。这种划分在当下也一直存在,有其实用性。现代的短篇小说与古典小说不同,其与现代长篇小说也有差异,都集中在艺术写法上。正如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所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sup>[2]</sup>根据胡适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茅盾<sup>[5]</sup>、俞平伯<sup>[6]</sup>、谢六逸<sup>[7]</sup>、施崎<sup>[8]</sup>、胡愈之<sup>[9]</sup>和哈米顿<sup>[10]</sup>等小说理论家都分别加以阐述。如,茅盾认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宗旨是“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这片段的‘人生’或者代表了‘全体’,那就是社会生活的全体缩影”<sup>[5]</sup><sup>[142-143]</sup>。

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梁实秋对这些主流看法颇有微词,他列举“新文学”家两种看法:一是“短篇小说是最经济的体裁”;二是“短篇小说是最现代式的”。针对这两种看法,他“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经济云者,系应指修辞学上避免

收稿日期:2020-01-03

基金项目: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启动项目“论转型时期长篇小说的衰落与短篇小说的兴起”(18D13)

作者简介:赵斌(1982—),男,安徽霍邱人,文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冗词而言”<sup>[11]184</sup>。显然,梁实秋试图剥离时代意识形态对小说的影响,从“纯文学”的角度看待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修辞学上避免冗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月报》“通信栏”曾经有汪敬熙与茅盾的一次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小说出现?”的学术讨论。汪敬熙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小说出现?》一文中认为,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和“写实主义”“人道主义”一样是小说家自我设置的三个写作“新镣铐”,束缚了小说家们的创新意识,以致于“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因为,“近年出的小说全是短篇小说,木的截面固然能代表其一生的经验。但是真要知道他一生的全体,还是非要观察他自种子至成大树的历史不可。”<sup>[12]</sup>汪敬熙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也有点道理。显然,他对短篇小说充斥文坛、长篇小说迟迟不能上场非常不安,而把不能产出长篇小说(他心目中的“佳作”)的“罪魁祸首”归结于短篇小说及其“横截面”写法,有“欲加之罪”之嫌。长篇小说不能产出的原因有多个,短篇小说“横截面”写法仅仅只是次要原因而已,因为,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有本质的区别。更有意思的是,茅盾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小说出现——复汪敬熙》的信中把长篇小说衰落、短篇小说兴起简单归结于“现在创作者大都忙于生活问题,并不能专心去做长篇”<sup>[13]</sup>,似乎有点离谱了。

茅盾还认为:“长篇小说的背景既是那么宽泛,布局又是那么复杂,里面自然有许多闲情闲笔。短篇小说不然,他是最讲究经济的。他的机构非常单简,一切不关紧要和阻碍进行的部分,都删去无遗。”<sup>[14]109</sup>当代作家红柯也说:“长篇小说的关键是结构,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框架作支撑……更依赖于理性与哲学,其结构框架具有稳定性……长篇小说是在盖楼房,不管是摩天大楼还是小洋楼,墙角很重要,墙角有裂缝说明结构有问题,肯定是危楼,墙壁或窗台有点小毛病不影响整体效果,长篇可以粗点……现代短篇不再依赖故事,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捕捉某些细节,动作、情绪、场景,甚至一段独白都能筑起一个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写艺术,对结构对语言更挑剔,短篇小说是细活。”<sup>[15]</sup>与茅盾的看法有点相似,意在强调短篇小说结构的重要性。

## 二、长篇小说衰落与短篇小说兴起的原因

中国转型时期长篇小说的衰落、短篇小说的

兴起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学界只言片语式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胡适说:《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所谓的“章回小说”“其实都是许多短篇凑拢来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杂凑的长篇小说的”艺术创作,“反阻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达”<sup>[2]</sup>。胡适从“章回小说”的内部结构分析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不发达的原因,从相反的角度暗示了转型时期短篇小说兴起的原因,似乎有点道理,但有点简单。转型时期短篇小说逐渐兴起的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包括长篇小说衰落、短篇小说兴起,“显然不是一个改造各种外国文学成分,改造传统结构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是一种本质上的突变,是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结构”<sup>[1]106</sup>。普实克这种看法很有远见。下面从小说外部的几个因素作些具体分析。

### (一)时代政治的需求

古今、中外冲突下的晚清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在此形势下,晚清、“五四”短篇小说凝聚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小说密切关注维新、革命等社会现实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反之,民族的救亡图存,个体的悲欢离合更需要晚清、“五四”横截面式的短篇小说来表达。

横截面式的现代短篇小说是从“新小说”家开始的。如果说,晚清“新小说家”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注意写与时代政治相关的当下生活,这是中国小说的新变。正如时人所说,新兴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专门描写下等社会苦难生涯的小说”,而这些“主要是短篇小说”<sup>[16]295</sup>。由于新小说家怀着强烈的揭露时弊的渴望,他们对于故事情节可能无暇顾及,只要能够宣传政治的走向就好,只要能够表露政治激情就行,即使是“似说部非说部”“似论著非论著”,只要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现实就是好的。

晚清小说家从古典小说“演说前朝”的故事模式中走了出来,他们关注于当下。于润琦说:晚清“短篇小说能够结合当时的政治思想运动,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事”<sup>[17]</sup>。如《路毙》《工人小史》《庆祝立宪》《小足捐》《入场券》《孤儿记》《平步青云》《渔家苦》《地方自治》等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以吴趼人的小说《庆祝立宪》为例,小说设置了一个会场,一个人物在“预备立宪”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以此揭穿官府借助立宪以达到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险恶用

心。小说只选取了一个类似新闻现场的“横截面”,有强烈的现场感及时效性,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所以说,长篇小说的衰落、短篇小说的兴起是与短篇小说传播新思想更为迅速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短篇小说相对反映生活要迅捷得多……有时比长篇还容易叫座……急功近利的时代,短篇小说往往会更热。”<sup>[18]</sup>正因为如此,短篇小说兴起势在必然。

相对于晚清小说家,“五四”小说家对时代的感受更敏锐,并且,他们有放眼世界的前瞻性。他们认为,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五四”抒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的流行也是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这种看法虽有以偏概全的偏见,也不乏进步的思想。如果说,晚清长篇小说具有群体性的话语特征,着重描绘国族巨变的整体取向和宏大愿景,汲取了章回小说的“缀段”结构模式,那么,“五四”短篇小说却具有个体言说的话语特征。为了表现强烈的个体意识,“五四”短篇小说选择了“横截面”的“非情节化”结构模式。奥博托·莫拉维娅说:“长篇小说具有一种从头贯穿到尾的、使其各部分结为一体的骨质框架结构,而短篇小说,不妨说,是没有骨架的……思想意识正是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野所在。”<sup>[19]</sup>言外之意,短篇小说思想意识很强烈,自然能够迎合“五四”小说家的意趣。因为,“五颜六色的生活,喜怒哀乐的情绪,时时敲响了文学的心弦,变成了一曲又一曲的短篇小说”<sup>[18]</sup>。“五四”短篇小说流淌出的正是“喜怒哀乐”的“五四情绪”。

有一个文学现象非常有意思。如果一个小说家没有长篇小说作品,似乎是一个遗憾,不圆满。茅盾曾经为不能早早创作出长篇小说感到汗颜,他说:“直到一九二七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sup>[20]</sup><sup>1</sup>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文坛领袖,又凭借小说立足文坛的鲁迅留下不少短篇小说佳作,却没有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探索考证这个憾事背后的主客观原因,也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据一些资料显示,鲁迅也曾有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构思,但都功亏一篑,非常可惜。鲁迅身边的朋友及后辈学人都深感遗憾。杨之华1961年8月30日给杨梦熊的一封信说:“他(瞿秋白)期待鲁迅先生写长篇小说,暴露社会的黑暗,刻划阶级斗争必经的路程,以教育后代。”<sup>[21]</sup>

冯雪峰也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不大喜欢辛克莱式的东西,但以为长篇小说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长篇小说也可以由作者变成为社会批评的直剖明天的尖利的武器的。”<sup>[22]</sup><sup>23-24</sup>

鲁迅能不能创作出长篇小说暂且不论,如果鲁迅创造出长篇小说,这种长篇小说是什么风格,也很难做明确断定。但可以结合材料及时代背景做一些推测:鲁迅在生命最后阶段(大概20世纪30年代)是打算写长篇小说的,并且,30年代已经有不少成熟的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可以作为写作现代革命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30年代的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能够为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一些叙事动力,因为30年代的历史有“明天”和“未来”,而五四时期的《明天》却是灰暗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鲁迅的“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式的长篇小说仍然有鲁迅式的“五四杂文笔法”,长篇小说也是作为“社会批评的直剖明天的尖利的武器”。也就是说,这种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和鲁迅的“五四”短篇小说风格是一样的,和鲁迅的杂文也是一样的,具有社会的时效性。在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短篇小说和杂文其实是一种必然。正如他自己说的,首先要生存,在短期的社会政治功利的影响下,鲁迅没有时间去写作反映一个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

另外,受到时代的影响,“五四”小说家目光很狭小,也必然带来一些弊端,如选材范围非常狭小。“五四新文学家”批评近代小说的材料狭小且非常下流,他们认为,“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除此之外,别无材料”<sup>[23]</sup>。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走出这种材料选择的“怪圈”,在男女恋爱的短篇小说中,“差不多都是叙述男女两个学生怎样的在公园相见,怎样的通信……人道主义的小说……一是写汽车碰死人,二是写工厂里工人的死,三是大洋房旁冻死叫花子”<sup>[24]</sup>。选材单一,且叙事方法和内容都非常相似。另外,“五四”短篇小说,“难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画面与巨大的历史事变”,“即使间接表现了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也是以小见大,且着重于人心而不是世事”<sup>[25]</sup><sup>222</sup>。受时代政治的影响,“新文学家”想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确实还不是时候。

## (二) 短篇小说翻译的兴起

中国短篇小说在经历了唐传奇和明话本的辉煌之后,在晚清获得了新生。时代给现代短篇小

说提供了更多的写作动力，西方短篇小说则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化及其繁荣都与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分不开。

西方小说的引进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说，早期翻译者大多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中国风格，但有意无意的误译会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宗旨，西化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西方小说的题材、结构、语言等艺术特点也在翻译过程中慢慢被接受。前文已经论述，现代短篇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横截面写法，而这种写法是从西方短篇小说“舶来”的。

清末民初，报刊业的繁荣为短篇小说提供更多的发表空间，但中国小说家自古以来就有“百回巨著”的小说创作理念，晚清小说家对短篇小说创作不大感兴趣，以至于短篇小说创作明显不足，满足不了报刊杂志的市场需求。怎么办呢？只有翻译。冷血、包天笑、周瘦鹃、马君武、刘半农、胡适等小说家译介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等欧美名家的短篇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林译小说”和“周译小说”。“林译小说”是指林纾与别人合作译介的欧洲小说，在当时很有名气，原因是翻译时间早和数量特别大。“周译小说”也有些名气，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代表了当时对外国短篇小说认知的最高水平。

很显然，西方短篇小说令新小说家们耳目一新。他们开始认识到：“近代的短篇小说，是截取人生的某片段……使读者可以在这某片段之中，窥悉这人生全部大概”，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却似乎“没有‘交代清楚’的必要。”<sup>[26]</sup><sup>[97]</sup> 周桂笙在翻译法国小说《毒蛇圈》时也曾经对中国小说批判过，他说：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sup>[27]</sup>。周桂笙等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小说家在中西对比中得出中国小说连贯叙事的不足。正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西学识见促使晚清短篇小说焕然一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晚清短篇小说中找到证据，如，晚清短篇小说中“奇峰突兀”的小说结构、淡化情节的“横截面”写法，远离了古典小说的“陈陈相因”。所以说，短篇小说的现代化与西方短篇小说翻译是分不开的。

“清光绪末年……撰译率皆长篇，蓬勃满汗

……自新文化运动之起，乃提倡短篇小说……以俄国作者如乞可夫、郭尔克等奉为圭臬。”<sup>[28]</sup> “五四”小说家对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非常卖力，各期刊杂志社都非常重视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出现了短篇小说翻译的盛况。梁实秋也说：“‘短篇小说’的体裁在新文学运动里要算是很出色的一幕……短篇小说我们中国古已有之，有人远引庄子里的故事，有人近举聊斋……殊不知新文学里的短篇小说……绝不是聊斋的文学习惯之继续……近年来报章杂志里的短篇小说……那一篇是模仿莫泊桑，那一篇是模仿柴霍甫。”<sup>[29]</sup><sup>[248]</sup>

### （三）报刊杂志的助推

报刊杂志是短篇小说兴起的主要推力。在报刊杂志这块阵地上，长篇小说相对于结构紧凑、篇幅自由的短篇小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一般来说，读者都有单期读完相对完整故事的癖好，诸多报刊杂志为了满足读者这种心理需求，报刊杂志登载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就为短篇小说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从另一方面说，短篇小说是报刊杂志的产物。

1904年，《时报》创刊，冷血任主笔。《时报》在开始就明确提出刊登“短篇”小说的主张：“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时报》中“短篇小说”的出现，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时报》每日刊登小说仅千言左右，限制了长、中篇小说的发行。即使可以连载，效果也未必好，因为，长篇小说连载时间长，读者很难持续读完故事，很容易生出厌倦情绪。而短篇小说的优势就很明显了，这从《时报》一则征稿启事中可以看出。该启事写道：“昨承冷血君寄来小说《马贼》一篇，立意深远，用笔婉曲，读之甚有趣味。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日本各日报各杂志多有悬赏募集者，本馆现亦依用此法。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sup>[30]</sup> 这种专门为募集短篇小说的征文启事在后来的报刊杂志上随处可见，并且，这种期刊刊载短篇小说的做法是借鉴日本等国外的经验，符合国际惯例。

从1906年开始，报刊杂志刊登短篇小说出现一个小高潮，这与吴趼人有很大关系。1906年，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创刊，对短篇小说的兴起做了不少贡献。首先，吴趼人是较早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他陆续在《月月小说》上刊出了《黑籍冤魂》《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等一系列短篇小

说,1908年结集为《跃人短篇九种》。其次,吴趼人在办刊的过程中很快发现短篇小说发表很分散,不能有效发挥短篇小说的刊载优势,于是开辟了“短篇小说”专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吴趼人的带动下,加之西方短篇小说的译介,小说家创作短篇的兴趣日渐浓厚。1907年,《小说林》也开辟了短篇小说专栏,并在创刊号上登载启事:“篇幅不论长短”,各种样式的小说都可以登载。

1910年7月,《小说月报》创刊。据统计,1910至1916年,《小说月报》每期都以长、短篇小说进行分类刊登,该刊对“短篇小说尤所欢迎”。恽铁樵选择鲁迅的短篇小说《怀旧》发表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小说月报》也设置“短篇小说”专栏,刊载大量的短篇小说。并且,在《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一号、第四卷第一号、五卷五号、六卷五号、七卷一号、八卷一号都一再强调:“本社征求撰稿译稿文言白话各种短篇小说”。

民国以后,报刊杂志刊登短篇小说更为普遍,从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个时段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枕亚浪墨》《徐卓呆说集》《瘦鹃短篇小说》《天笑短篇小说》《铁冷碎墨》《定夷说集》《娟门红泪》,等等。这些创作实绩与报刊杂志集中刊登短篇小说分不开。到了五四时期,短篇小说已经兴起了,报刊杂志刊登短篇小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再多言。

#### (四)创作观念的影响

作者的创作态度也是短篇小说兴起的动力。1922年,谭国棠通过《小说月报》评价当时的创作情况时说,当时的“创作大都是短篇的,长篇很是寥寥,便是那些短篇中……其味甚淡,看惯刺激性极强的红男绿女的小说的中国人,一定觉得干枯无味……这些小说本来用意极浅薄,情节亦颇简单”<sup>[31]</sup>。谭国棠对“五四”小说没有长篇小说非常不满,对出现的短篇小说也不满,原因是短篇小说的情节简单,不刺激。显然,谭国棠自身的小说观念有其抵牾处,他对短篇小说“人生断片”(横截面)书写很赞赏,有所谓当时流行的“为人生”写作的进步观念,但同时又用传统的“刺激性极强的红男绿女的小说”标准来评价小说,很显然其有古典小说的“巨著”观念,这又是落后的。

我们知道,“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小说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长篇章回小说”<sup>[25][39]</sup>。换言之,“晚清这一时期的作家似乎都迷恋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一百至一百二十回

的古典小说的‘巨著’观念,因此,他们的小说本来只是松散的事件,他们却要把这些事件整合成一个均质的整体。”<sup>[1][14]</sup>这可以从曾朴1928年7月6日的日记中得到印证:“我一向不大做短篇小说,偶一为之,未见特色,姑再尝试,看看成绩何如。”他还说:“不过现在我在文学上的事业,却没有发展满足几部想做的书”<sup>[32]</sup>。可见晚清小说家曾朴即使到了1928年对短篇小说还很鄙视。

“五四”小说家没有之前小说家的那种“巨著”观念,他们对“巨著”型长篇小说很警惕,杨振声在《〈玉君〉自序》中说:“《水浒》《红楼》等长篇小说,都是偏于横面的写法,所以写了个全社会,写来又是那么长,作者终身只能作一部。”<sup>[33][23]</sup>杨振声认为,《水浒》等长篇小说“终身只能作一部”有点得不偿失。1919年1月《新潮》出刊,主要发表了北大学生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因为,他们没有创作经验,他们的小说创作观念来源于胡适“横截面”短篇小说理论,也来源于对鲁迅短篇小说的摹仿上。这样,《新潮》作家群的创作观念与晚清小说家们肯定不一样,他们对创作长篇小说可能无暇顾及,或者也根本就不感兴趣。更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的一些小说家,特别是冰心、陈衡哲等女性小说家,他们进行创作大都是无心而为之,甚至“从来没有学过写作的艺术”<sup>[34][36]</sup>,对创作长篇小说也没有清晰的理解。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对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界限也不是特别明晰。如,陈衡哲后来说道:“我生平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16年的《中国学生季刊》上,那时候我已经是美国瓦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sup>[34][36]</sup>这“第一篇文章”就是短篇小说《一日》。作者记忆有误,此短篇小说发表在她丈夫任鸿隽和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而不是《中国学生季刊》。并且,在作者心目中它是“文章”,接近于描绘日常生活的散文。有些评论家也把《一日》看成一篇散文。可想而知,这种“尝试”者的创作心态很难创作出长篇小说,只能在短篇小说与散文之间游离。冰心等小说家的创作理念与之相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短篇小说的兴起与小说的阅读者也有密切关系。由于“晚清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辛亥革命后的小说读者主要是小市民,而‘五四’小说的主要读者则是青年学生”<sup>[25][21]</sup>,所以,晚清读者都有“巨著”观念,对短篇小说没有兴趣,以至于,《域外小说集》刚刚出版就备受冷遇,“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

头,却已完了!’……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sup>[35]1</sup>。民初的小说读者是小市民,他们对世俗短篇言情小说自然偏爱;“五四”小说的读者是青年学生,他们有“个性解放”的思想,自然对写“人生”的短篇小说爱不释手。可见,作者、读者也是短篇小说兴起的幕后推手。

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中,长篇小说的衰落、短篇小说的兴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时代是最重要的因素。时代转型影响了小说的文体转型,这是根本原因。在时代转型的影响下,向西方学习成为了必然趋势,其中,短篇小说翻译是重中之重,也为短篇小说的兴起注入了活力。大量翻译短篇小说,是为了满足报刊杂志的需要。早期的报刊杂志有一半文章都是翻译类作品。国内原创力不足,国内作品无法满足报纸杂志的需求,翻译也就日益兴盛起来了。从另一方面来看,转型时期的小说家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毫无创作经验的青年小说家们日渐成为了创作主体,他们作为小说创作的“尝试”者,对创作长篇小说无暇顾及。他们一方面学习鲁迅等小说家,写出一些“横截面”式短篇小说,一方面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写一些类似散文的短篇小说。由此可见,转型时期的长、短篇小说之间的嬗变有其特殊性,也是暂时的。五四时期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和报刊杂志的多样化(逐渐出现了刊登中、长篇小说的杂志),这种“一枝独秀”的小说创作现象也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 参考文献:

- [1] 普实克. 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M]. 郭建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2] 胡适. 论短篇小说[J]. 新青年,1918(5).
- [3] 郑振铎. 郑振铎说俗文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 郑振铎. 西谛书话[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5] 茅盾. 话匣子[M].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 [6] 俞平伯. 谈中国小说[J]. 小说月报,1928(2).
- [7] 谢六逸. 小说作法[J]. 文学旬刊,1921(10).
- [8] 施崎. 小说概论[J]. 越光季刊,1924(3).
- [9] 化鲁(胡愈之). 最近的出产:《隔膜》[J]. 文学旬刊,1922(5).
- [10] 哈米顿(Clayton Hamilton). 小说法程[M]. 华林

一,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11] 梁实秋. 偏见集[M]. 南京:正中书局,1934.

[12] 汪敬熙. 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小说出现? [J]. 小说月报,1922(3).

[13] 雁冰. 为什么中国没有好小说出现——复汪敬熙[J]. 小说月报,1922(3).

[14] 严家炎.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17—1927)[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5] 红柯. 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J]. 东吴学术,2015(2).

[16]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7] 吕润琦.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J]. 明清小说研究,1997(3).

[18] 王蒙.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J]. 读书,1993(9).

[19] 奥博托·莫拉维娅. 论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异同[J]. 邓中杰,译.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9).

[20] 张闻天. 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1] 杨梦熊. 瞿秋白对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关注和期待——杨之华两封遗札所示的一段史实[J]. 新文学史料,1982(4).

[22] 冯雪峰. 过来的时代——鲁迅论及其他[M]. 上海:新知书店,1948.

[23]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1918(4).

[24] 玄珠(陈望道). “情节离奇”[J]. 文学旬刊,1922(4).

[25]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6] 芮和师,等.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27] 知新室主人. 《毒蛇圈》译者语[J]. 新小说,1903(8).

[28] 吴宓. 评杨振声《玉君》[J]. 学衡,1925(39).

[29] 梁实秋.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30] 编者. 征稿启事[N]. 时报,1904-10-29.

[31] 谭国棠. 来信[J]. 小说月报,1922(2).

[32] 马晓冬. 曾朴日记手稿中的文学史料[J]. 新文学史料,2015(1).

[33] 杨振声. 杨振声文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4] 陈衡哲. 塑造我人生道路的影响[M]//一支扣针的故事.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

[35] 鲁迅,周作人. 域外小说集[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影印版).

(下转第 96 页)

# **Wu Rulun and the Reform in Education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LIANG Yanl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Wu Rulun, a scholar and educator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As local official, he raised money, hired famous teachers, and tried to manag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s lecturer in Lianchi Academy, he reformed and innovated the education. Although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ought were born ou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e was clearly aware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Western learning. Offering English and Japanese courses was the early attempt to promote modern education. The change in his education activity w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social system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is academy education reform was a part of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Wu Rulun; education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合 壹)

(上接第 63 页)

## **The Decline of Novels and the Rise of Short Stories in the Period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ZHAO B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novels and the rise of short stories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re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 The reasons for its occurrence are very complicate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world's short stories, the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translation),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novels such as Chinese politics of the time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pt of trauma, etc.

**Key words:** modern transformation; novel; short story; decline; rise

(责任编辑 梅 孜)